

我的新闻生涯

(第二卷)

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组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9 • 北京

我的新闻生涯（第二卷）
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组编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7号）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1/32，印张15.125，插页2，字数390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5000册

ISBN 7 80041 155-9/C·114

定价：5.50元

目 录

初见毛主席·····	赵超构(1)
时代的赐予·····	林里(7)
五十年记者生活的回顾·····	刘时平(24)
为讲真话干一杯·····	吕建中(36)
新闻眼·····	吴昊(46)
责任感、学习和理论的坚定性·····	周修强(57)
我做理论编辑经历的几件往事·····	蒋映光(66)
在外当记者 在家当编辑·····	迎秀(76)
路上,处处有青草·····	汪波清(86)
到大海的深处去捉“大鱼”·····	张天来(97)
一晃五十年·····	张西洛(111)
还没有做完的文章·····	纪云龙(120)
笔走龙蛇竞纵横·····	张颂甲(132)
总有追求在前头·····	李海燕(144)
要实现报纸存在的价值·····	梅朵(156)
采访生活随笔·····	唐海(167)
半个世纪的跋涉·····	徐开垒(174)
一个文化“苦力”的往事·····	林丛(185)
在人生的跑道上·····	郭梅尼(195)
追云逐雨意未休·····	叶祖兴(207)
跋涉在新闻工作的道路上·····	陆炳麟(218)
我与改革共命运·····	赵阜(227)
记者要说真话,写实事·····	李宏林(236)

体育记者生活“罗曼蒂克”？	苏少泉(244)
三次办报的回顾	陈健吾(251)
抓问题报道的体会	林振夏(258)
不勤于始将悔于终	李芳木(270)
透过笔迹是心迹	吴伟(280)
真实，维系着报纸的生命	毛士博(289)
半个世纪的追求	刘黑枷(296)
把握自己、完善自己	张仲彩(306)
屡经艰险志不移	戴煌(316)
记者是历史的见证人	丁曼(328)
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苦与乐	喻权域(336)
《半月谈》牵动着亿万读者的心	闵凡路(350)
记者之路是闯出来的	孙世恺(361)
探索与追求	杨正泉(373)
在人民广播事业中锻炼成长	杨伟光(389)
电波传五洲，友谊通四海	胡耀亭(404)
我与电影艺术	王维超(416)
由外行向内行转化	王佳璠(424)
挫折不馁志，艰险不回头	黄小岑(432)
我和漫画生涯	王乐天(445)
新闻摄影记者的艰辛与欢乐	李华(459)
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时盘棋(473)

初 见 毛 主 席

——写于44年前的一篇访问记

赵超构



前言：1944年5、6月间，我作为重庆《新民报》的特派记者，参加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初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共的领导人以及延安各方面的人士，受到很大的教育。回重庆后，根据此行的所见所闻写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当时的国统区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实况。这是我的新闻工作中的最难忘的一页。这里就将《延安一月》中初见毛泽东主席（原题为《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一章作为反映我的新闻工作生涯的一个片段，同时也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的雪泥鸿爪。当然，这已是44年前的旧作，对于那时作者的观感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的，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1988年7月盛暑之日

毛泽东先生招宴，是在6月12日下午6时，那天早上便发来了浅红色的请柬，招待人同时说明，希望我们在下午4时就去，为的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长谈。

对于一个中共领袖的宴会，我们是没有理由敢于迟误的，大

家都准备好了，上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郑重，而颇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人坚决的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渡过清浅的延河，驶行了10分钟，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共办公厅和大礼堂了。再驶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办事人员的住宅，车子一直驶进大门。门口站着两名卫兵，是我到陕北来所见到的最整齐的红军。

我们被引导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这个客厅，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长又宽，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可以坐四十个人的丁字形桌子，洁白的桌布，摆着鲜花，壁上除了四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两边，一幅是斯大林委员长，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们纷纷到来，各找着对手谈话，我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这颇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发上，依着我的习惯，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所有客人的局促与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进来。

由周恩来先生介绍，毛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

身材颇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

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谈话会大约继续了三个小时之久，先由毛先生说一段话，再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几十分钟的话，如拼作一句讲，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认为惟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也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议论本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异。使我觉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词句异常的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象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偾兴”的样子。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事实上，对于民主的原则，我们任何人都几乎没有什么异点可资辩论，至于民主的程度，以及这一党对于那一党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样的估计，那就难说了。

一边想着，一边倾听，日色渐渐向晚，通红的夕阳映着满堂辉煌。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后的油画上，斯大林委员长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摊着掌心，眉飞色舞地面对我们，似乎在雄辩，又似乎在向我们说教。

这时候，一种思潮蓦然在我脑中起伏。斯大林不是一个伟大的坦白的现实主义者么？他从来不创造什么空中楼阁的漂亮议论，他的议论一贯是为现实的斗争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承受斯大林作风的中共领袖们的议论，与其从议论本身去理解，实在还不如从他们环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易于接触真相吧！

晚餐以后。我们在大会礼堂看戏。

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场。

对于平剧缺少修养的我，这四出戏，算是比较能够理解一点

的，在开幕前的锣鼓声中，我静坐在最前一排，胡乱地思索着这四出平剧是否也有共产党的宣传意味，《打渔杀家》之为革命剧，大概是无异议地可以通过了。《鸿鸾禧》是否表现恋爱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古城会》有没有强调关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类乎此间所传说的游击战故事？

用这类的眼光来看戏，本是大杀风景的事；以这样的观点来评戏，实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却无论如何驱逐不了这样的思考。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坐在我右侧，和我并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

一时，我有点感到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了。因为此时见到的毛先生，并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几杯酒吧，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

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的发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

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

散场时，已经夜 11 时，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归途上，缺月衔山，清光似水，朋友问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印象，我明快的答道：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在这里，不妨带便谈一谈我对于毛泽东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

的。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泽东说一声“组织起来”，于是通过干部，通过报纸，以至于无知识的乡农都说“组织起来”。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自然，单从宣传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权威，是不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权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点也绝不能抹煞。他本身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曾以这个问题就教于许多共产党人，同时自己也冷眼的观察，综合起来，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原版翻印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的社会来。在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据说，从中学生时代起，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斯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产党所有的组织宣传，以及列宁斯大林的经验，毛泽东成功了。

边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上面的论断。这个有机会时再说，我现在先提一两件小事为例。

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象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妆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

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工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工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我无意介绍共产党员对他们领袖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批评或者有溢美之处。我也不想在这里判断毛氏在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因为这是颇费口舌的工作。我现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们的一般干部有什么特别优长之处，这是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们所应该知道的。

时代的赐予

林 里



写别人，写惯了，似乎比较容易；写自己，可就难了。

难就难在：我经历了威武雄壮的斗争，却没有丰功伟绩，没有勋章锦旗。

可是——

我也没有虚度年华。——我跟着时代的脚步，奔波，跋涉，攀登。总算没有掉在后边。

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国家受难我遭殃，国家兴旺我舒畅。

掐指一算，记者生涯已过43年。

在一般情况下，记者，起码是个大学生，知识分子，文化人。可我，一没上过大学，二没读过中学，三呢？五年的学生生活，是在我那既贫穷又偏僻的小小村屯的小学度过的。

青年时代，或者说抗日战争时代，我从事工人运动，先在铁路工人游击队当兵，后调地方。我当过工人抗日救国会的秘书，在太行山上的襄武左矿区做过煤矿工会主席。就在从事工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对报纸工作，特别是对新闻记者的工作发生了兴趣。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1945年，我奉命下山，到河北平

原。趁着调动工作的方便，我闯进《冀南日报》社，要求当记者。

那是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冀南日报》刚刚复刊，正在酝酿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接管大城市，正是用人之急。我找到报社社长，找到主管干部的负责人，我的档案材料，主事人连看也没有看，便一口答应下来：

“到采通科报到。”

就这样，我当了记者。

40年代，是把千百万人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年代。我想当记者，就果然进了报社。

我被收留到报社，完全是时代的恩赐，时代的给予，时代的需要。

当然，我要当记者，也不全是想入非非，也不是没有一点把柄，我的最大把柄是八年的敌后抗日战争生活，实际上是上了八年“社会大学”。何况，我还在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过一年又三个月。

1943年3月，我被派到襄武左矿区。那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最困难，最危险，最残酷的年月，加上百年不遇的旱灾和虫灾，真是困难重重。我的落脚点，在襄垣北部的一个小小村庄，叫新庄。

在新庄，很快认识了所有的人。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趁此机会，我做矿山调查，了解矿工生活。我从大量调查材料当中，提出恢复煤矿生产，救济失业工人的方案。我把方案写出来，送给襄垣县委，送给第三专员公署，送给晋冀豫区职工总会。襄垣县委根据我的报告，令抗日民主政府拨了救济粮，拨了救济款。又令我和工商局一起，制订了太行根据地的第一个《矿山管理条例》。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襄垣煤矿业的复兴》，送交太行新华日报。结果，很快刊登出来。出人意外的是：文章发表以后，其它矿区纷纷仿效，推动了全区整个煤矿业的发展。我，从中认识了舆论的重要，认识了报纸的力量。

1944年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群英会”。煤矿工人代表同军火生产者的代表同在一个小组。我把太行山上的著名劳动模范，号称“炮弹大王”的甄荣典同志的事迹记录下来，加工整理，送到报社。当年的《新华日报》太行版，用了第一版的整版篇幅刊登出来。从此，我成了业余作者，积极通讯员。

到冀南日报社那天，我带上我的所有作品的剪报。我想，万一报社不肯接收，我便拿出剪报，请他们瞧。

战 火 重 燃

冀南日报派我采访军事调停小组。我先后去了聊城小组和永年小组。

国共和谈，军事调停，说穿了，是缓兵之计，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其实，谈是谈，打是打，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止。震惊中外的邯郸战役，就发生在河北省南部的大门口。邯郸战役，以我方全胜而告终。至此，冀南解放区除了永年县城一个孤立据点以外，已是一片净土。

1947年元旦，蒋军三十二师和一四一旅的四二三四团，占我大名，战火重又在河北省的南大门燃起。

我军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吃掉入侵大名之敌。

2月初，冀南日报组成战地记者团。我和朱力航日夜兼程，赶赴大名。——随军，打仗，上前线。

但是，当我们在2月6日赶到大名的时候，蒋介石军队已在5日夜晚仓惶逃窜。

我写了如下报道：

恶毒残忍丧尽人性（眉题）

蒋军造假坟活埋人民（主题）

大名群众悲愤控诉蒋军暴行（副题）

战争期间，地方报纸的记者，一般都兼任新华通讯社的记者。这条消息，先在《冀南日报》上刊登，后在晋冀鲁豫区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播发延安以后，又为各个解放区的报纸所采用。四天以后，新华总社发来电报：

“最近，总分社能供给典型的生动的好稿件，甚为欣慰。……三月一日，总社转播的朱穆之同志作：太行小型合作社，及晋冀鲁豫总分社记者作：大名蒋军暴行，是两篇可供研究的稿件。前者简练的报道了一个生产致富的工作典型，后者生动的悲愤的暴露了蒋军罪行，其文亦不过五百字。”

从此，我成了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兼职记者。

从调查研究开始

1947年初，我到鸡泽省采访。

在临近春节大年的前几天，我同县委书记韩国治同志一起，下乡检查拥军优属工作。那时，鸡泽刚刚完成平分土地，农民群众兴高彩烈，一片欢腾。为军人家属准备的年货，堆积如山，丰富空前。农民家里，大锅蒸，小锅炒，欢天喜地，十分热闹。我从农民的生活情况和欢乐情绪当中，看到了平分土地的巨大威力。我写了《年关杂记》，登在2月1日的《冀南日报》上。但是，越想越不满足，越想越觉得鸡泽的变化绝非偶然，应当大书特书。

我把我的感受，说给韩国治同志。韩国治告诉我，他早想把平分土地经验总结总结，以便提高群众，提高自己。怎奈，时间紧，工作忙，坐不下来。他还告诉我，办公室里堆了许多调查材料，没人整理，更没人研究。他说，农民起来闹翻身，求解放，本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不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对不起我们这个时代，对不起农民群众。……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些材料拿给我看看？韩说，巴不迭地呢。可以全部拿给你，可以供你研

究。需要的话，还可以给你配个助手。

当我把平分土地的材料稍微浏览了一遍，便怎么也不忍放手。我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所吸引，认为是无价之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于是，我打消了回家过春节的念头，一头扎在材料堆里。经过整理，分析，综合，很快有了头绪。兴奋之余，我对韩国治说：鸡泽了不起，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

“土地改革”？韩国治似有疑虑。又低声细语：“区党委布置的是平分土地。”

“平分了，不就是改革？”我直逼一句。

“等等，我查查文件，看党中央是怎么提的。”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要全国各个解放区放手发动农民，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战争影响，有些地方来不及贯彻执行；有些地方理解不深，执行不力。多数地方没有认真对待。鸡泽则不同。鸡泽利用秋后冬前的有利时机，大规模地开展了分田斗争，随又进行了填平补齐，运动相当深入。第二天一早，韩国治兴致勃勃地跑来了，说：“中央文件上有这个提法——想通了。提到理论高度上来认识，平分土地也就是土地改革嘛！”

我写了《鸡泽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调查报告。《冀南日报》用了将近两个版的篇幅，在1947年2月12日和13日两天刊登完毕。那时，一张报纸，只有现在的一半，用将近两个版的篇幅，刊登本报记者的调查报告，《冀南日报》还很少先例。现在来看，一个县的土地改革的完整资料，确有史料意义。

纠偏反左何所惧

在宣传土地改革上，我们的报纸，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毫不犹豫地站在贫雇农一边。但是，1947年9月的土地会议以后，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是侵犯中

农利益。对此，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迅速纠正。1948年麦收前后，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又一封群众来信，要求退还中农财物，要求认真兑现政策。那时，报社刚刚结束了整党反右，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党员干部受了批评，做了检讨，深怕再犯“立场不稳”的错误，不敢正视侵犯中农利益的稿件，不愿接触纠左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领导找到了我。

“你出身贫农，由你去写纠偏报道，别人不敢说三道四。——只有你去，才合适。”

我接受了纠偏报道的任务。不过，我不想利用出身优势，也没有这个必要。我认为，党中央的纠偏指示，是阶级路线，阶级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像中央文件所一再强调的，侵犯中农利益，也就在根本上违反了贫农利益。我从维护党的政策的角度，理直气壮地到了邯郸市郊的苏曹村。

在苏曹，我找到揭发问题的群众，一户一户查对。又找到驻村干部，一件一件核实。随即写了报道，标题为：

苏曹村尚未纠偏（主题）

邯郸县委熟视无睹（副题）

此报道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头条位置上刊登出来，还配发了《希望邯郸县委迅速端正政策》的评论。

这时，我已做了将近三年记者，写批评报道却是头一次。一个普通党员，批评一级党委，会有什么结果？登报以后，坐卧不安。再看报纸上的大标题，就越发感到不可收拾，特别是当我知道邯郸县委不服，已告到中央局的时候，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同时，我想，我是奉命办事，于心无愧。对于邯郸县委，素昧生平，互不相识，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恩怨，再说，记者的报道，一经发表在党的报纸上，就不再是记者个人的意见，而是编辑部的认识。想到这里，我觉得委屈，抱怨邯郸县委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老记者为什么不愿意写批评报道。我才真正明白，编辑们为什么不大敢接触纠偏稿件。想着，

想着，我又回到批评邯郸的报道当中，我替中农说了话，替被错斗了的“地主”说了话，就这两条，对方就可以扣我个“反攻倒算”的帽子，就可以给我作个“利用报纸批评，进行阶级报复”的结论。我，贫农成份，工人出身，扣我不住。我终于得出结论：根本不理那一套。

值得庆幸的是，人民支持，其他报纸支持。县委告状，人民群众也告状。著名作家赵树理主持的《大众报》，用头号大字，通栏标题发表消息，

邯郸县委轻视党报批评（眉题）

读者不断来信表明纠偏仍未普遍进行（主题）

接着，地委组织调查组，冀南区党委组织调查组，通过实地调查，他们作出结论：《人民日报》的批评是正确的，必要的；邯郸县委坚持错误是不对的。

我松了一口气，算是放下了包袱。同时，我懂得了党、党报，党报记者的关系。我批评了一个县委，高于县委的两级党组织出来说话，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党是统一的整体。党报记者，只有按照党的政策行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真理在胸笔在手，只有在党的政策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行事，才有记者的个人自由。党报记者不同于自由职业者，党报记者的一言一行，都要服从于党的利益。组织性和纪律性，对于党报记者具有极端重要的特殊意义。

为“五年计划”作准备

1951年春初，党中央把注意力转向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的准备，要人民日报派人作企业调查，并指定由社长范长江同志牵头。范长江接到任务，立刻召集各部主任开会。他抽调五六位部主任，要他们亲临第一线，保证企业调查如期完成。同时，又抽